本版编辑：沈 辉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418

教育视野

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建设

学校是文明的灯塔，教师是乡村文明的星火，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途径；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核心在教育，基础在交通，长远在产业；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石，兴教育、拔穷根，办好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关键在教师，根本在投入。目前，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乡村学校发展的隐忧不容小觑，必须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作为事关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的大事精准施策。

□ 戴小明

中国的根基在农村，扶贫的重点在农村，农村的希望在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但由于中国疆域广阔，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巨大，尤其是中西部山区县域经济总量小，财政基础薄弱，地方财力脆弱，乡村学校点多面广，投入长期不足，历史欠账多，基础教育艰难，乡村学校建设滞后，隐忧不容小觑。从对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师大量流失，师资队伍极不稳定；工资福利待遇低，青年教师心不安；留守儿童比例大，教师非教学任务重；师资青黄不接，结构严重失衡；基础条件简陋，仪器设备不足；通讯网络不畅，信息化尚未起步；交通不便，师生出行困难。

古人云：“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农村基础教育、乡村学校建设是近年中央着力的重点。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并明确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修订《义务教育法》《教育法》。2016年5月，《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当前，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任务艰巨，各地“要注意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要改变单一治理思维，注重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精准制度安排与财政支持下，汇聚社会大爱，鼓励民间力量助教助学，引导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乡村文化建设。

优化顶层设计，统领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建设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核心是有效推进资源下沉，强基固本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这就要求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入，将农村基础教育纳入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战略统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以及高山高寒地区乡村教育发展；要汇聚政策合力，以足够的强度和精准度，优化差别化扶持举措，完善相关政策，聚焦综合施策，持续精准发力，让政策受益面真正受益；要加大偏远山区基础教育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将山区乡村学校建设纳入脱贫攻坚整体规划，启动偏远乡村学校建设工程，设立偏远乡村学校发展基金，深度推进“全面改薄”，加速山区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进程。

建立乡村师资队伍稳定机制，保障教师潜心育人。安贫乐道值得敬仰，但清贫不应该是教师的标签，特别是乡村教师。为此，必须大力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的落地见效，尽力改善乡村教师待遇、工作生活环境，切实保障教者从优、优者从教：建立城乡教师定期轮岗制度，引导教师有序流动；建立住房保障机制，实现偏远乡村教师在县城（或集镇）人人有住房，只要达到规定服务年限政府赠与，缓解乡村教师后顾之忧，也可增加青年教师交流交往机会，解决他们因长期工作生活在乡村找对象、子女抚育、照料老人难题；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夯实“省级统筹、省县共担”财政保障，逐步补齐城乡教师福利待遇差距，确保乡村教师实际收入高于城镇教师、高于公务员队伍；健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高年资教师疗休养计划，让乡村教师有尊严地工作生活在农村大地。

建立乡村教师质量保障机制，改善结构提高素质。师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根本。办好乡村学校，关键在教师，而优秀教师必须依靠长期发现、培育、积淀，乡村教师补充要切忌短期、临时性项目，否则后患无穷。因此，要科学评估近年来免费师范生、资教生、三资一扶、特岗计划、国培计划，以及正在推行的新机制教师计划等项目绩效，适时改革乡村教师培养模式，推进校地协同，地方政府根据实际需求，从本科院校教师教育专业择优选拔培养对象，定点、定岗、高标准、本土化、订单免费培养；要注重在岗培养，加强定期化在职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适应教育互联网+新态势，大力提高乡村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要创新体制机制，尝试政府购买工勤服务，减轻专任教师非教学负担；要完善配套政策，因地制宜尽快出台适应乡村学校特点和需要的教师编制与师生比标准。

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中华家庭教育优良传统。教育是系统的，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家庭是根，没有家庭教育的基础，没有爱的滋养和呵护，其他教育将会是空中楼阁。古人智慧：“蒙以养正”“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至要莫如教子”“养不教，父之过”。启迪人们儿时的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观，自觉传承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着力引导青年家长以子女教育为重，亲近孩子生活，陪伴孩子成长，减少留守儿童数量，防范“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从根本上化解留守儿童社会难题。通过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现阶段尤其要特别落实保障随迁子女就学和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真实传播贫困样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治理。30多年的农村改革，以及近年来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的强力推进，偏远山区村寨与全国广大农村一道变迁，除重病、残疾、孤寡等特困家庭，贫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吃穿温饱问题，但有的村庄文化贫困、教育贫困、信息贫困日益凸显：乡村学校消失，家庭教育断裂，留守儿童激增，传统村庄衰落，乡村文明式微。学校是乡村文化的高地，农村贫困的治本之策在教育——办好乡村学校，提高农民素质，复兴乡村文明。而在公共财政资源短缺、有效供给不足时，必须真诚善待民意和社会财富，主动对接媒体引导公益力量助学资教，形成全社会关注乡村、关注基层的强大正能量，进一步凝聚社会稳定最基础的向心力，激发村庄发展内生潜力，增强贫困家庭致富动力，培育新时代的新型农民。

诗教与为政

□ 李文文

在《论语·为政》的开篇，正在谈“为政以德”，突然话锋一转，孔子品评起《诗》来。这在平常人看来，多少有些突兀。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有人认为政治是讲求实效的，是刚硬的，是理性的。但是，诗是浪漫的，是风花雪月的，是温柔的。这两者之间的跨度好像有点大，会有怎样的关联？这需要我们真切地洞察古代圣哲的思维体系：价值观与方法论、理念与通达路径往往是一个同步的概念，他们在齐步走。

回首《为政》的开篇，为政以德的本质在讲为政者本人要有德。如何实现为政者有德？如何提升领导干部的素养，熏化他们的美德呢？离不开教化。在古代的教育体系中，《诗》教是重要的内容：

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孔子说自己每到一个国家，就知道那个地方的教化情况。教化和文化不是经由口号喊出来的，不是标语贴出来的，是人们的一言一行在承载和表达。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只需到它的公共场所，到最需要排队的地方，去看一看秩序的情况，再去公共卫生间，看一看卫生的情况，就基本反映出一个大概。

诗，是关乎人心的教化，培养的是温柔敦厚的心性。诗，何以会起到这样教化的作用呢？这与诗的源起有关。例如：春时之时，看到盛开的桃花，人们就有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感叹！桃花尚且有如此美好的生命，人呢，应该有怎样的使命与追求？于是，一位远嫁的女子是“子之于归，宜其室家；子之于归，宜其家室；子之于归，宜其家人”。宜室宜家成为女子的本分，只有宜其家人，而后才能教国人。仲秋时节，当天上升起一轮明月，人们就想问一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道是我先看到了天上的月亮，还是天上的月亮先照到了我？

这样看，诗的本质是直接而深刻的生命体悟。也正是因为对于生命体悟的直接而深刻，所以若是以一言来表达诗的意蕴，就是“思无邪”，是诚，是正，是真，是善，是美。有唯美的情感，健全的心智，还有无限的遐想。

诗在表达生活，也是教化之方，事实上，它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一种灵动的，关于灵魂的熏化。如同南方吹来的风，和煦、温暖、富有人情味，给人以滋养。人的心地，就恰似一方土，土好，庄稼更易生发得繁茂。心地纯正，思绪无邪，正是为政以德的根基所在。

经典今读

重塑文化中国形象

□ 金元浦

国际形象是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及其公众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它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工厂”，再到如今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百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讲，真正深厚的东西是文明和文化底蕴，这才是文化中国最基本的面貌。

“文化中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它蕴含着一个在经济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博大浩瀚的文化蕴含、开放进取的文化品格、崇尚和平的文化理想的由衷愿望。重建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中国面对世界最为深厚的积淀。中国古老文化历经5000余年，是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绵延至今的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人类童年时代便已产生的、不可企及也无法再造的世界文明的辉煌顶峰之一。

儒家哲学中的人本、民本、刚健、自强、革新、崇德、仁义、爱众、人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念，对于现代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运转以及个体的人格养成具有重要意义。道家和道教的道器、重生、贵生、自然、尊道贵德、齐同慈爱、性命双修等观念所表现出的人生智慧，也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佛教文化中的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容忍、圆融、解脱等一系列理念，对于当代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与个体心理的调适，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观经过现代转换，对当代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很长时期内，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只是被动地扮演了西方文化“他者”的角色。西方通过“他者”这个参照系，来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以谋求发展，带有浓重西方中心论色彩。按照萨义德的东方学观点，“东方”是一个整体的地缘概念，是一套西方言说和凝视“他者”的话语方式。“东方”除了作为空间的地理概念、自然的存在之外，更是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隐喻象征，是西方在认同自身文化时，通过想象而建构出来的“他者”，作为与西方相对立的一个“东方”而存在，因此在“东方”这个概念上历史地附着一种固定的意象联想、定势的思维系统以及语词表述习惯。

在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定式里，由长期历史经验累积的对中国异域形象的想象模式的惯性力量，使有关中国的“事实”都失去了自足性，有关中国的话语表述都被放在已有框架中被“原型”化，以符合西方人的既定想象，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参照意义，维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事实上，西方媒介话语建构的关于中国的认知系统，远远不同于中国的经验与现实，是中国在跨文化传播话语权缺失、被弱化的失语状态下被“他者”化的一个表述。西方媒介话语中对中国的“他者”定型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对中国的原型想象，这种原型比客观经验还更具有坚固性和塑造力。西方媒介通过想象进行的象征性构建，也即西方对中国的“他者”定型是在真实中国缺席的情形下完成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形象的一种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处理。从中国一方来说，需要不断地敞开自我寻求理解，逐渐改变西方媒介话语对中国狭隘的表述框架。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争取与运用好传播权、发言权，争取在国际社会自我表述的机会，做自己的话语主人。

文化视野中的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

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的深层共性，是文化性。文化不仅是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在深层次的关联，并且使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理念和精神境界的彼此贯通。

□ 徐庆超

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的文化性

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的深层共性，是文化性。文化是密切二者关系的“黏合剂”，是深化认识这一关系的“钥匙”，是理解其根本逻辑的“向导”。

国家形象的文化性，可以从其文化要素、文化功能和权力属性这三个方向上去探求。

第一，从文化要素上讲，国家形象构成要素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等因素，而文化要素居于核心地位，在其他要素包括整体国家形象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基因”。第二，从文化功能上讲，与文化之于国家形象的本原性影响相应，国家形象对文化也会产生影响，即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该国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进而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反之亦然。第三，从权力属性上讲，在国家形象构成要素中，经济和军事要素主要以硬实力为依托，表现出较强的刚性，而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等要素则主要以软实力为依托，表现出较高的柔性。国家形象是糅合、平衡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一种“巧实力”，其外在形态和呈现方式是柔性的。国家形象的建立与推广，是以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国际规则和信息等软实力来源为载体进行的。

关于公共外交的文化性，需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外交有着特定的文化使命，而不是仅限于对文化交流作为手段的运用，否则，就难以把握公共外交的本质。从广义文化的角度说，公共外交以文化交流为表、以文明融合为里，文化使公共外交能够实现“表里如一”。第二，文化性是公共外交作为“新外交”区别于传统外交的最显著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规定了公共外交的其他特性。公共外交意在激活蕴藏在民间的非政府力量的潜能，构成对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挑战。第三，文化是公共外交的核心传播介质。以信息、知识和价值为层面的柔性传播，实质上就是一国包括过去和现在主流文化的对外扩散，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早期形态和发展渊源。

道术并进的策略性

文化不仅是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在深层次的关联，且使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理念和精神境界的彼此贯通，直达理论家们所追求的“心灵政治”。国家形象因其“巧实力”属性而用来代表“力”，公共外交更是一种以文化为载体塑造国家形象的“术”，西方的心灵政治在中国话语系统中则接近于“道”。

这里的“道”，一个是作“道德”解。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均以文化人、以德服人，这是二者共通的道义境界；另一个是作“规律”解。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的成功与否、成效大小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坚持“道”，即是否能够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外交范式之处在于，二者是以不同范围的国际公众为对象所开展的对外活动，因此，对国家形象的好坏、公共外交的成败，做出判断的决定权主要地不是在国内公众手里，而是在国际公众那里。

形象也是利益。国家形象“力”的增强，同时需要公共外交“术”的发达和心灵政治“道”的助力，一个是向外用力、发达了工具，另一个是向里用力、强健了心智。在中国有可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务必要坚持“道术并进”的原则，树立全面的国家形象观、推进有效的公共外交，并在实际工作中讲究策略。

在“道”的层次上，重点做出如下规划和部署。第一，“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品牌设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蕴含宝贵价值的人类精神财富。“文化中国”应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设计的主要思路，发挥优势、自成一格。第二，“美丽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在培育。“美丽中国”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而且是涵盖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在内的总目标，体现为：清明政治、良性经济、包容文化、法治社会、优美环境，并亟需在有形表象、精神内涵和国家行为上下工夫。第三，“责任中国”国家形象的外在展示。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必要要求，所要承担的责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内，保证国内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另一个是对外，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国际援助、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

在“术”的层次上，应实现多元立体国际传播渠道的互联互通、协同推进。第一，增强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改变西方对华刻板印象、竞争国际话语主导权。其中的关键在于，确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及其“信息源”地位。第二，充分利用具有主场优势的全球性媒介事件，增加中国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表达、强化自觉国际公关的力度。对于像奥运会、G20峰会、世界妇女大会等全球性媒介事件，加强科学谋划、积极舆论引导，做好主场外交、展现中国魅力，累积起来，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优势。第三，加强“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引导、管理和服务。在国际旅游的语境下，国内外普通民众直接的交相互动常态化，以个人为载体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现实可能性大增。在微博、微信等个人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应鼓励“人媒介”发挥正效应、传递正能量，承担起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使命。

文化视界